

□作家近况

# 付秀莹： 陌上花开异旧时

王十月



付秀莹

针、爱梨、敏子、素台、小鸾、香罗、望日莲……她们的性情与命运。

秀莹写人们种庄稼。写“芳村的田野里，也种满了坟头。”她多次写到田间的坟头。我很想知道，她写下“种满坟头”时，内心充满了怎样的悲悯与荒寒？世人眼前的付秀莹，总是一袭清汤挂面的长发，总是那样善解人意地微笑，《陌上》透着的，该是她微笑背后常人不易察觉的苍凉心事。

她在小说里几乎没有写下大的事件，没有核心的人物核心的故事，她写下的是一群人的人生，一群人在这一时代裹挟下不由自主的改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陌上》写下的，是这个时代主要的真实，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大事：农耕社会土崩瓦解前的最后挣扎。

想起2016年底，作代会期间，在大会堂广场遇见秀莹，两人在寒风中聊文学，聊对当下中国文学的看法，聊作家要面对这个时代，要写出中国人在这个时代隐秘的心事。现在算来，那时她的长篇稿已经交给了出版社，她并没有说起她的长篇新作，我们聊怎样办一份有理想的文学期刊，聊如何借她主持的《长篇小说选刊》和我供职的《作品》为中国文学做点有益的事。她还很谦虚地说她办刊没什么想法，要向我多多求教。但很快，我看到了《长篇小说选刊》在她主持下的变化，她办刊和她写作一样，不事张扬而成竹在胸。

付秀莹延续的是沈从文、汪曾祺一脉的中国抒情小说传统。《陌上》却不是单纯的抒情小说，她笔下的芳村也不是桃源。我一路读来，读到的是沉重与苍凉。秀莹用几近白描的手法，哀而不伤地书写着她的“陌上中国”，或者说正在远去的“陌上中国”。她用无比的耐心与怜爱，画出了“陌上中国”苍凉的背影：那些老人，那些青年。那些婆婆，那些媳妇。那些茂盛在田野里的植物。那些孤寂在荒原上的坟头。翠台、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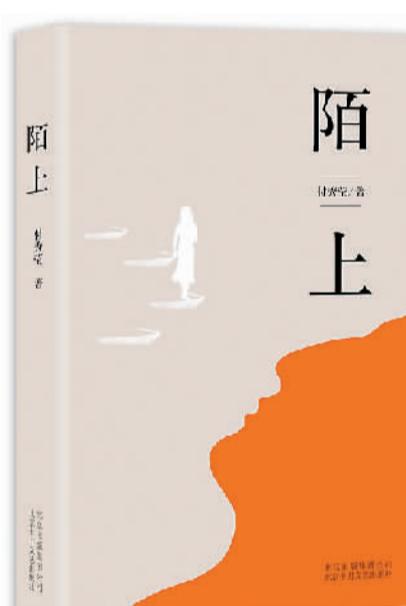
平提供了丰富、新颖而有效的经验。毋庸讳言，我们的主旋律文学创作确实不太尽如人意，许多生活中非常感人的人与故事一旦搬进了文学作品便味同嚼蜡，许多被民众共同关注令人振奋的大主题到了文学作品中一下子失去了原有的重量、魅力与深度。时间一长，读者对主旋律文学创作似乎越来越失去耐心和信心，既不叫好，更不叫座。

问题出在哪里？其实很简单。关键是我们许多作家没有将主旋律文学作品作为文学来对待。不管主题如何重大，题材如何重要，都要按照文学的规律来创作，不管哪一类作品，只有具备了文学的优秀品质，它才会得到读者的喜爱，从这个意义上说，主旋律并不享有非审美的豁免权。《人民的名义》可以说再主旋律不过了，作品彰显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的主题，传达的是人民呼唤公平正义、风清气正的强烈愿望，契合的是

还是她的新作《陌上》。《陌上》写了两个不同的中国。一个是在“楔子”里描写的中国，那该是秀莹童年记忆中的乡村：贫穷，却透着温暖与美好，那是典型农耕文明状态下的陌上中国。她如数家珍地交待每一年芳村人过的每一个节日。我才知道，原来河北乡下的老鼠正月初十嫁女，而我的家乡湖北荆州，老鼠腊月二十三嫁女。湖北老鼠和河北老鼠翻看不同的黄历么？

秀莹写了另一个中国：农耕文明与传统伦理崩塌下的“陌上中国”，写了在这大崩塌前人心的惊惶与变异。《陌上》的成功之处在于，作家将这巨大的变迁，落实到了芳村数十个人物的日常生活上，不动生色，白描勾勒，让人物的行动与命运来说话。

读完《陌上》，我写下了这样一句话：《陌上》之前，“陌上”属于唐诗宋词；《陌上》之后，“陌上”将属于付秀莹。至少，在可见的很长一段时间，这个词，将专属于付秀莹。“陌上”这个词，和她的形象竟是如此妥贴，让人觉得，这个词就该属于她，乡村与城市、农人与读书人在她身上完美结合。正因为此，她写出了独属于付秀莹，不同于



文学前辈陈忠实、贾平凹、莫言的中国。前辈所写的是“乡土中国”，付秀莹所写的是“陌上中国”。陈忠实依托乡土写的是民族秘史，他的心不在陌上桑麻与农人的家长里短间；贾平凹是写家长里短的好歌，他的许多小说也唱着乡土社会的挽歌，但作家有时玩味着落后与愚昧，和农人的心终究隔了一层；莫言的乡土中国更像是抽离了柴米油盐的中国寓言。付秀莹笔下的中国属于田间地头，属于庄稼，属于农人的节令，属于家长里短婆媳人伦，属于农人，属于诗。

在中国的文学传统里，陌上一直属于农人与诗人。“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这是韦庄。“陌上柔桑破嫩芽，东邻蚕种已生些。”这是辛弃疾。“不堪攀折犹堪看，陌上少年自来迟。”这是杜牧。“临风一曲醉朦胧，陌上行人凝恨去。”这是晏几道……“村子四周是庄稼地。庄稼地里生长着庄稼，也生长着工厂。”这是付秀莹。

有论者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断言：莫言获奖，标志着中国文学乡土书写的巅峰与终结。可见，中国有强大的乡土文学传统，并建立起了完备的乡土美学。乡土文学的疆场上，已挤满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雄心勃勃的青年作家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开疆拓土。好在，城市文学尚有大片荒原，写城市成为明智之选。但付秀莹却固执地坚持书写她的“陌上中国”，还原当下乡村正在发生的事物，从写作策略来说，这不是聪明的选择，但从正在变化的现实来看，乡村和乡土正成为文学创作新的发力场。

再说，文学从来不是聪明人的事业。文学是智者的事业，更是仁者的事业。

还有什么比心怀苍生更重要？



感、小忧伤为主。传统长篇那种深刻的主题、重大的题材、宏阔的场景、众多的人物、激烈的冲突和汪洋恣肆的语言不再是主流。我们当然知道，长篇需要发展，但这种发展不能以牺牲传统为前提，不能以抛弃长篇艺术的多样化为代价。当长篇越来越小越来越轻时，我们在长篇中便难以看到时代的潮流，难以感受到时代的精神和思想的光辉。而许多长篇的艺术手法也渐渐流失，包括人物塑造的方法、复杂的结构营造、戏剧性冲突的设计技巧等等都稀有传承。现在的长篇似乎不需要生活的积累与艺术的修为，许多年轻作家上手就来，门槛变得越来越低。这样的局面如果成为主流，长篇小说将难以完成本来的文化功能，变得徒有其名。这时候就可以看出周梅森这批作家的力量了。就以《人民的名义》来说，它对时代的呼应，它对现实的批判勇气，足以鼓荡起人们的豪情，满足人们对社会巨大的思考量，而其对正反两方面典型的刻划，包括对许多小人物的精雕细刻，都使得文学人物的画廊不断增容，而对侯亮平等人物的塑造，使久违的英雄式形象得以回归，从而复活了人们心中的英雄审美情结。

与之相对应，以英雄人物为引领，对社会全景式的反映和富有哲学意味的反思使得长篇小说再次显露出史诗的光芒，这无疑是一种崇高的美。

文学有其审美的历史性和时代性，但艺术观念的进步应该使我们对文学的进程有更自觉的思考和积极的应对，仅以长篇制作来说，轻重并重才是其多样化的发展之道。我们当从这个高度来估量《人民的名义》这类作品的审美价值。

我自忖也算个新生事物接受者，并不太落伍于时尚什么的，虽然使用手机是在1997年4月，那次在广州，朋友说那里便宜，就带回一个黑乎乎的“诺基亚”，第二天就在单位附近小店里选了号（那时全是“1390”开头，众多小店也可上号），用上手机一晃近20年。近几年，手机功能一天一个样，这微信已成为时尚，起先于我不太有兴趣，有一搭无一搭的。最近手机升级用上微信，只是个潜水员，但觉得这劳什子可人，了解资讯，基本不用看电视，读报纸，听电台。掌上浏览，方寸之间，随时，随时随地，及时，即时，查资料，看新闻，知晓天下，搜寻古今，或者有点八卦、乌龙什么，轻松愉悦，不亦乐乎。与人联系，快捷方便，偶尔看一下朋友圈，各路神仙的行迹什么，五花八门，各位亲们晒台上的自恋自嘲自炫，不一而足。择优点赞，或当看客，显山露水，很是好玩。间或有好文章，读得脑胀眼酸，觉得有意思，拍照留存。于我们，这手机微信的出现，不只是一个信息源，也延伸了阅读空间，或者说，新的技术，带给我们的写作与阅读以很大变化，意义非凡。

说这些，是因这一年一度的散文年选。面对海量的散文作品，我们如何在手机时代的快阅读，分众化的阅读中，认知当下的散文以至文学呢？即是说，手机的流行，微信的横空出世，从以上角度看，对新闻已经是横刀夺爱了，而对文学，不像新闻具有颠覆性的影响，但也影响强烈，至少对于散文，有不小的触动。微信的许多内容，也可作为散文看待，微信的情感表达和交流方式，可以让文学的阅读变得更便捷，更实用。

微信，是不是散文，也许仁智互见，各自有理。但是，微信的直接，简洁，直率，真切，以及流播之广之迅疾，是不争的事实。对于散文这样精致和短小的文体样式，它较为自然快捷地融会，利用新技术传播，让文字插上翅膀，轻舞飞翔。在我看来，高雅的文学放下身段变得流行，无远弗届，成为人们实时交流的一个平台，这微信功莫大焉。微信中的或长或短文字，即兴而作，片断感受、零星述怀，或现场实录，或不乏自我的炫耀搞笑，随意地发散在朋友圈中，见事理，见性情，也见智识。由此想到，除了内容的随意、自由、轻松外，文字的精练和精粹，写作的自由放松，也是它有别于那些正襟危坐的文字的地方。

有人说，微信虽小，方寸中有乾坤，是散文世界里一方邮票、一则团扇。从时下散文阅读的角度看，手机微信，是一个潜在的散文世界。也许多年后，文学的文本变得如何，不得而知，但是，新的技术，对于文学的影响会是层出不穷，不可小视的。如今，面对发展变化了的阅读，文学摒弃那些高大上的文字，被人诟病的虚假的文字，多一些灵性、性情，接地气，有烟火味的东西，学一学微信，是有益也有意义的。尤其是与其天然亲近的文字的地方。

有人说，微信虽小，方寸中有乾坤，是散文世界里一方邮票、一则团扇。从时下散文阅读的角度看，手机微信，是一个潜在的散文世界。也许多年后，文学的文本变得如何，不得而知，但是，新的技术，对于文学的影响会是层出不穷，不可小视的。如今，面对发展变化了的阅读，文学摒弃那些高大上的文字，被人诟病的虚假的文字，多一些灵性、性情，接地气，有烟火味的东西，学一学微信，是有益也有意义的。尤其是与其天然亲近的文字的地方。

## 书写新时代英雄篇章

杨 文

“新号角——2017丁酉新春军民诗会是今年文艺界纪念建军90周年的第一个诗会，将推动全国诗歌创作和部队诗歌创作的繁荣发展。”日前在京举办的座谈会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说。

战略支援部队少将强勇说，这次诗会对于推动部队诗歌创作、推广群众性诗歌创作、朗诵、发展有积极作用。军诗创作是强军文化的重要部分，以诗载道，弘扬主旋律，弘扬正能量，宣扬强军梦；以诗言志，通过诗歌创作宣扬报国之志、登攀之志，英雄之志；以诗抒情，赞颂广大官兵的家国情怀。正如诗评家吴思敬指出，军旅诗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我们在借鉴西方诗学思想时，也要研究中国古代诗学传统和新诗百年的诗歌传统。最有说服力的是中国古代的边塞诗，它达到了诗歌的高峰。军人在面临战火、生死考验时看到人生深刻的一面，军人的奉献精神需要我们去发现、去观察，为诗歌提供无穷的创作源泉。

诗会上，围绕峥嵘岁月、军民一家、军旅情怀、强军梦想等主题，瞿弦和等多位朗诵艺术家和解放军官兵同台献艺，朗诵不同时期诗人创作的优秀作品。

## 陈贵田《种谷台诗钞》具有时代气息

由中国诗歌网主办的“当代诗人系列研讨会”之陈贵田诗集《种谷台诗钞》研讨会在京举行。与会专家认为，陈贵田的旧体诗受唐诗影响较深，充溢着家国情怀和时代精神，诗人与家乡、时代、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把现实和想象、叙事与议论、状物与抒情相结合，情真意切，格调清朗、旷达，表现了诗人的忧患意识和积极明朗的人生态度。



扫描可关注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微信公众号“文艺园”

□新作评介

## 长篇的崇高之美

——评周梅森的新作《人民的名义》

汪 政

历时八年，六易其稿，周梅森终于在新年到来之际为读者奉献出了他的又一部政治小说《人民的名义》。对这部新作，可以言说者甚多。我以为它首先为我们如何提高主旋律文学作品的创作水

平提供了丰富、新颖而有效的经验。毋庸讳言，我们的主旋律文学创作确实不太尽如人意，许多生活中非常感人的人与故事一旦搬进了文学作品便味同嚼蜡，许多被民众共同关注令人振奋的大主题到了文学作品中一下子失去了原有的重量、魅力与深度。时间一长，读者对主旋律文学创作似乎越来越失去耐心和信心，既不叫好，更不叫座。

问题出在哪里？其实很简单。关键是我们许多作家没有将主旋律文学作品作为文学来对待。不管主题如何重大，题材如何重要，都要按照文学的规律来创作，不管哪一类作品，只有具备了文学的优秀品质，它才会得到读者的喜爱，从这个意义上说，主旋律并不享有非审美的豁免权。《人民的名义》可以说再主旋律不过了，作品彰显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的主题，传达的是人民呼唤公平正义、风清气正的强烈愿望，契合的是

当下从严治党、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但是，周梅森带来的是让读者惊心动魄的故事，是环环相扣、戏中有戏的连台大戏，是性格丰满而独特的人物，是下到底层劳动者，上到党的高级干部，包括商界、企业、金融，以及社会灰色地带的各色人等，是现实的浮世绘，是时代的众生相。作品以一个省域为故事空间，并以其政治生活为主要的故事内容，以重大腐败案件的侦查为故事动力，层层推进，抽丝剥茧，不断将故事推向高潮。作品不仅生动地展示了反腐倡廉斗争的惊心动魄，而且对当今中国的复杂的政治生态、多样性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样的作品不仅是对当前社会主体的积极回应，同时也满足了读者审美需要，给人们带来了酣畅的精神享受和富于挑战的理性思考。

所以，我认为这部作品不能仅仅从社会价值与现实意义上进行评价，它同时对当前的长篇小说创作带来了启示。不能不说，新世纪以来，中国的长篇小说创作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种“轻质”的“小长篇”似乎渐渐成为主流。这些长篇多以日常的局部生活为背景，人物少，人物关系简单，几乎没有什么是大的戏剧冲突，主题也大都以一些小情

周 梅 森